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稿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

□ 马立诚(北京)

改革开放 30 年，气象万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我这里提出一个思路和框架，梳理和概括 30 年的历程。这就是“30 年来的四次大争论”，也就是四次大突破。

第一次大争论是从 1977 年到 1978 年前后。争论的内容是，“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第二次大争论是从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争论的内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第三次大争论是从 1995 年到 2002 年十六大，争论的内容是，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第四次大争论是从 2004 年一直到十七大，争论的内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

这四次争论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过去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到今天利益的博弈凸现出来，还有就是改革的技术层面也有争辩，比如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有时，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两个月，我骑车经过天安门，看到东观礼台前墙贴出一条刚刚好的大标语：“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三副一正，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时，在1975年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个职务。这幅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语呢？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4月5日，运动被

镇压，388人被捕。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决议。这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显然是一个冤案。但是，民众的呼声很快遭到了压制。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主席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这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凡是”的近期目的，就是阻挠邓小

平出来。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毛泽东,不许人们对“文革”那一套理论提出质疑。

5月24日,当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如果要讲“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天安门事件合乎情理的问题。

两个月之后,在党心、民心强烈支持下,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正职务,但是“两个凡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当时,中央党校展开了一个活动,就是总结“文革”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学员中出现了两

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文革”的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由孙长江执笔的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单纯阐述理论,它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比如文章说:“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比如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说,这篇文章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当时压力非常大。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5月30日,

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当时成千上万的冤案压在人们头上，非常紧迫。开会第二天，陈云就提出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王鹤寿、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冤案应该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等等，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人纷纷响应，并且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比如“二月逆流”冤案等。这就打破了原来的议题，华国锋控制不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会议开到11月25日，华国锋讲了十点，包括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等等。

25日之后，很多人在会上发

言，点名批评汪东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压制讨论。接着，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战胜。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华国锋做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思想，他要负主要责任。汪东兴也作了书面检查，表示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辞职。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

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现在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三中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然三中全会也有历史局限,一是全会公报提出用法律手段保护人民公社体制,这个问题后来随着农村改革解决了。二是说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这个问题后来也解决了。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举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一些说明。

一、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文革”中全国干部有17.5%被立案,高级干部75%被立案。胡耀邦在邓小平等人支持下,推倒这些冤假错案,为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平反,也为像张志新、遇罗克等民间人物平反。同时,为地主、富农摘掉帽子,为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二、小岗村包产到户。1978年11月24日,18户当家人代表20户农民立下生死契约说:“我们分产到户,如不成,坐牢杀头也甘心。”在五六十年代,三次包产到户都失败了,很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说小岗这个契约是生死契约并不夸张。当时,华国锋不同意包产到户。他说,只要狠抓阶级斗争,把人民公社的精神灌到社员心里,农村就有希望。后来,在1998年,万里在人民大会堂对我说,包产到户真是不容易,北京很多领导人都反对,当时负责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陈永贵都反对。幸亏邓小平支持,才取得成功。

三、成立特区,杀开一条血路。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北京开会,要求创办特区,得到邓小平支持。当时谷牧、江泽民也都大力支持,才有了特区的今天。

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命题,批评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5个弊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说:像斯大林这样破坏法制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篇文献指导下往前走。

五、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一个不当措施。1600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跟农民争饭吃,与城市化相反。1600万人后来回城,没有工作,被逼无奈,自己干起来了。裁缝、修车、大碗茶等个体户,就这样诞生。这些救命的举措,当时被有些人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后来经过反复论辩,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最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

们回顾一下,1977年的十一大报告说:“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1984年的《决定》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往前走了一大步,是一个重大突破。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冯兰瑞等人提出,中国处在一个“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初级阶段”的最初提法。后来,“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受到批判,稍后风波又平息,最后演变成初级阶段理论。胡耀邦日后多次讲话以及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深刻阐释,成为各种经济改革措施出台的理论依据。

八、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

出双轨制。实行计划内、计划外(市场)两种价格,以便慢慢过渡到市场经济。

九、农村在80年代中期开始海选,大约90万个行政村的村民开始选举村委会。

十、文化方面的变革,包括《伤痕》、《班主任》等小说问世;邓丽君、李谷一通俗歌曲唱法的争论;朦胧诗的争论,星星美展的争论,话剧《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等等。

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当时私营企业减少了50%,个体户减少了15%。1990年2月22日,一位权威人士在北京某大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文章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质问: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当时第一篇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所谓的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另一家北京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我们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这个讲话,却故意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了。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在很多单位里,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改

革开放,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开会的时候,每个人发言都跟报纸对口径,当时的局面非常严峻。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很多主动就失掉了。他还说,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针对北京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邓小平说:当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不要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是,他的讲话精神,通过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

邓小平讲话之后半个多月,从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

开始,皇甫平接连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篇评论,第一篇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第二篇是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是3月22日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4月2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针对北京铺天盖地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浪潮,皇甫平的文章驳斥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我这里举出一些文章的标题,大家一看就清楚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姓资》等等。请看某篇文章下面这一段话:“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及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这实际上

是向邓小平理论挑战。

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很多报纸、杂志都紧跟着发表类似文章,比如《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等等。

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捏一把汗。这样下去,改革开放还怎么搞?

邓小平面对这种形势,也十分焦虑。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思考的问题,有如他在“文革”中下放江西的时候,在“邓小平小道”上的思考。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时间留给这位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庆幸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了最后一把力气,推了中国一把。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

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一下子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凡是从1992年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邓小平讲话激起的改革开放的热潮,人们一下觉得阴霾廓清了,思想解放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就是用市场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对猖獗一时的“左”的思潮给予有力回击,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要求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

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1992年4月25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左”讲话,震动朝野,这是来自高级领导人的最犀利的防“左”檄文。

二、上海股票市场一飞冲天。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由市场引导。仅3天时间,股票暴涨570%。

三、下海潮。南方谈话之后,大批官员、知识界人士下海,成为全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

四、个体私营经济爆炸性增长。

五、党中央、国务院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措施,比如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城市,加快物资、商业、财政、教育、科研体制改革,下放经营管理权等

等。

六、199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50条”。

《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展开税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这比1984年的《决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七、经济增长摆脱了前两年徘徊在5%左右的局面,1992年当年增长13%。

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对留学生的宽容政策,欢迎留学生回国,“海归”逐渐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第三次大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这一时期有个新的东西出现,就是社会广泛流传的万言书。

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于1995年初流布。该文说,中国的所有制结

构变了,阶级关系变了,社会意识变了,执政党也变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把共产党“连锅端”。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文章提出,苏东剧变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内由于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和平演变危险大大增加。因此,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条战线,开展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阶级斗争。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底问世。该文说,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该文反对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的方针,说为了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小的国企也不能放,要保住所有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

《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在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之际流传开来。这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名单,还开列了许多“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媒介名单。名单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和理论家,以及许多重要媒介。要求对这些人和媒介采取严厉行动。

这四份万言书,开启了“左”的代表人物发表不同政见的一种形式,造成很大困扰。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说,一些干部看了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

1997年5月29日,邓小平逝世后3个多月,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就是针对万言书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江泽民在谈到学风问题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就对万言书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提出

了批评。江泽民在讲话中还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更直接地拒绝了‘左’的选择。

这一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观念。

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更进一步肯定了“资本的活力”，要求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并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万言书的作者们要求压制和打击私营经济的企图失败了。到目前，非国有经济加在一起，创造了中国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和80%的出口，并且吸纳了将近两亿人就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私营经济并不是祸水，而是活水。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厉有为事件。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

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党校写了一篇学习体会，题为《关于所有制的思考》，在学员班里传阅。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公有制可以和私有制并存，互相融合。他还提出一个介于公与私之间的“社会所有制”的概念即股份制。北京一些“左”的代表人物就拿厉有为开刀，散发万言书，批判厉有为搞私有化，“想毁掉我国的公有制”。这些人还要求将厉有为撤职并开除出党。稍后一段时间，我去看厉有为。他告诉我，就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刻，江泽民看了他的文章，并且在中南海接见他，鼓励他“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

二、“陈卖光事件”。1993年到1994年，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把这个县级市里的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卖了272家（该市一共有288家小企业），得了一个小外号叫“陈卖光”。北京一些左派杂志、报刊就骂他是“私有化先锋”，“反社会主义”，搞得很紧张。当

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1996 年到诸城考察, 得出结论说, 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陈光后来升任菏泽市市委书记。

三、私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的争论。2001 年 7 月 1 日,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 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 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应当把其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一些人散发万言书, 强烈指责这一建议是“把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 改变了党的性质。”

四、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开始, 各地陆续开展产权改革, 先后持续了十几年, 既取得了很大成就, 也产生不少问题。问题主要是有的地方暗箱操作、私相授受; 有的故意低估国企价值, 从中牟利; 有的投资者收购国企之后随意打发职工, 造成职工生活困难等等, 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

五、加入 WTO 有利还是不利。在中国加入 WTO 前后, 有些人说, WTO 是西方国家套住中国的绳索, 是扼杀中国经济的软刀子, 主张不加入。当然, 这种主张被实践否定了。

第四次大争论: 中国的改革搞错了?

这次争论从 2004 年“郎咸平旋风”开始, 一直延续到十七大。

争论中, 有意识形态因素, 有利益纠葛, 还有改革的技术层面的东西, 有些问题是三者纠缠在一起, 因此比以前的争论复杂。

这个争论有个大背景。这就是, 多年来 GDP 高速发展, 既取得了光辉成就, 也造成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和成就相比, 虽然是第二位的, 但也非常严重。

近年来, 很多人都在议论新的三座大山: 医疗、教育、住房。除了这三座大山之外, 还发生了一些重大灾难性事件比如山西黑砖窑事件等, 再加上一系列恶性腐败案, 还有国企改革、征地拆迁中的问题等等, 导致怨气丛

生,凸现了城乡差别、两极分化、腐败成风、环境恶化,以及借改革之名寻租营私等诸多问题。这次争论与这些问题有关。

在这次争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四个旋风、两个万言书和一本书。

四个旋风。第一个是“郎咸平旋风”。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国企改革鲸吞国有资产,引起轰动。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郎咸平进而声称国企效益比私企好,要求停止国企改革,并且著文声称现在是中国历史五千年来最黑暗的年代,遭到诸多有力反驳。第二个是“刘国光旋风”。2005年,老资格经济学家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文章成为热点。他说西方现代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边缘化,并提出了“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还说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三个是“巩献田旋风”。

2005年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滞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第四个是“张勤德旋风”。张勤德自2004年以来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极“左”文章,点名批判50个著名人士,破口大骂,给他们扣了上百顶耸人听闻的政治帽子,从而引发诸多纠纷,有人准备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两个万言书。第一个是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这些签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第二个是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

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回到毛泽东时代。

一本书是《纪念毛泽东》。这本书公然要求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号召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要求没收房地产公司的财产分给穷人，甚至不惜暴力革命。此种倡议，理所当然遭到多数人的拒绝。

十七大对这些来自“左”的挑战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第四次大争论做出了结论。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又强调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说，今年要大力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

十七大结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不少措施，如降低公益

事业收费门槛、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等，着力改善民众生活，解决环境恶化等问题，受到民众好评。有些重大措施如加快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制定医疗改革方案、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等还在进一步推进之中。我觉得这方面的动作应该加大力度，以缓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分配，使全国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最近，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力倡新的思想解放，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在第四次争论的复杂博弈过程中，颇有一些人觉得改革停滞，突破无力，甚至还有倒退苗头。汪洋的讲话，给沉闷的氛围注入新的活力，呼唤了新的期待和努力。汪洋提出，要有忧患意识，要有世界眼光，要以人为本，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北京学界对汪洋书记力倡思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希望大家一齐努力，把思想解放的呼唤和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和寻找新的突破口结合起来。

刚闭幕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界人士对此反响强烈,觉得讲到了点子上。这就是一个新的突破口。这是多年来中央第一次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方面,应当集思广益,提出思路。像直选乡镇长、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党内差额选举的力度,实施党代表常任制,各级人大代表直选,以及实施公共财政等等,都是可以考虑试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

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非典”事件和南方雪灾。2003年上半年肆虐全国的“非典”,凸现了知情权对于广大民众的重要性,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怎样做才能维护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同时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场瘟疫和今年初的南方雪灾,都是对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检验和挑战。广州市政协副

主席郭锡龄质疑铁道部在雪灾中的作为,公开讨论诸多教训,推进问责制,在全国带了民主议政的好头。

二、“原罪”之争。2004年上半年,媒体热炒部分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历不明,引发诸多争议。有人主张用搞运动的方法清算私营企业主。有学者指出,这是在煽动民粹主义。确有一些私营企业主搞官商勾结,牟取非分财富,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私营企业家一棍子打死,煽动仇恨富人和打劫富人不会带来社会进步,这与“炮打茅于軾”事件有着深刻的联系,内在逻辑就是民粹主义。另外,“原罪”也不是法律概念。

三、私营企业主当选全国劳动模范。2005年,私营企业主第一次被纳入全国劳动模范评选范围。五一节前夕,最后评选出来的2969名全国劳动模范中,有30位私营企业主。与此相关的是,2003年3月,出席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2900名代表

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有 200 多名,约占代表总数 10%。

四、取消农业税。2006 年,全国农村免除农业税,同时向农民提供多项农业补贴。2007 年,实现了全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这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大德政。

五、医疗改革激辩。2006 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宣布医疗改革失败,随后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有人主张把全民医疗纳入公益范围,主要由政府买单。有人主张推进并完善市场方向的改革,打破医疗事业封闭状态,扩大开放,实现多元化。最后由卫生部会同相关部门吸收各方意见制定改革方案,牵动着全国人心。方案难产,至今未出台。

六、陈良宇腐败案。位高权重,成串连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文数额,百姓衔恨。这个案子和湖南郴州官员集团腐败案再次敲响警钟,时不我待,必须支持和加强各种方式的监督,通

过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寻找遏制腐败的良策。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2007 年,一件西南城市的拆迁个案,竟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牵动了全国民众的眼球。何以至此?其中蕴藏的内涵,早已超出这件个案的补偿金额,它彰显出老百姓对权势人物强行征地拆迁的强烈反弹。老法学家江平主张依法办事,却遭到猛烈攻击,令人忧虑。

八、厦门 PX 事件。2007 年 3 月,105 个全国政协委员建议迁建,未能阻止厦门 PX 建设进程。到 5 月底 6 月初,互联网形成强大舆论质疑 PX 项目,再加上厦门民众通过网络和手机互动,上街和平“散步”,终于使环境保护上升为首要考虑目标。随后,厦门市政府启动公众参与程序,促使多方利益实现共赢。在这一事件中,“电子民主”跃然而出。这种“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在上海磁悬浮列车路线选址的争论中,再一次得到体现。